

The academic research valu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in the Daqingshan Anti Japanese Guerrilla Base Area

Jie Xu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Marxism,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China

Abstract

The Daqingshan Anti Japanese Guerrilla Base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fulcrum established by the CPC in the northern border area where Mongolian and Han live together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This article takes it as a sample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reinterpreting the “revolutionary resilience” of peripheral areas, pointing out their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logic centered on survival priority, ethnic coordination, and dynamic adjustment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The second is to reveal the diverse practices of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and provide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unity and resistance of multi-ethnic area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upper level unity and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lass demands, and other strategies; The third is to demonstrate the bidirectional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 history and macro narrative, emphasizing that specific practices can enrich macro theory, and macro perspectives can enhanc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icro details. The struggle process of this base area provides a key case for understanding the locality, complexity, and format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

Daqingshan Anti Japanese Guerrilla Base Area; Revolutionary resilience; National united front; Micro history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斗争史的学术研究价值

徐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蒙汉杂居的塞北边缘地区创建的重要战略支点。本文以其为样本，从三方面深化了抗战史与革命史研究：一是重新阐释边缘地区的“革命韧性”，指出其在极端环境中以生存优先、民族协同与动态调适为核心的韧性建构逻辑；二是揭示民族统战与革命动员的多元实践，通过上层联合与基层动员相结合、民族利益与阶级诉求相融合等策略，为多民族地区团结抗战提供历史经验；三是论证微观历史与宏观叙事的双向互补关系，强调具体实践能丰富宏观理论，宏观视野可提升微观细节的历史意义。该根据地的斗争历程，为理解中国革命的地方性、复杂性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案例。

关键词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革命韧性；民族统战；微观历史

1 引言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全国 19 个抗日根据地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于塞北地区建立的重要战略支点，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深山区。其斗争史既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关键局部，更是研究敌后抗战战略布局、民族关系与基层动员的典型样本。从学术研究价值来看，该根据地地处蒙汉杂居区域，面临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等多重势力交织的复杂环境，其骑兵游击战术创新、“蒙汉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实践”及“自给自足抗战经济

模式”，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多元治理形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案例。从历史认知意义而言，这一斗争史是凝聚民族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清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条件下团结蒙汉各族群众、凝聚抗日力量的实践，印证了“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力，对当代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启示。

2 对“边缘地区革命韧性”的再理解

“革命韧性”指革命力量在长期复杂艰难的挑战中展现的持续坚持、适应调整和不屈不挠的能力，是革命克服挫折、实现目标的重要特质。中国革命历程中，从武装起义挫折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探索，从长征艰险到抗战持久坚持，

【作者简介】徐杰（2001-），男，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在读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均彰显了强大的革命韧性。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处于阴山腹地的崇山峻岭之间。在抗日战争中,大青山区以其特定的位置,成为整个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作为典型边缘地区^[1],地处华北边疆与草原过渡带,叠加自然环境恶劣、民族构成复杂、多重敌对势力交织的属性,远离核心根据地,缺乏成熟革命基础辐射,还面临日军分化策略、国民党顽固派摩擦与极端严寒的三重挤压。这种独特语境使其存续发展历程突破了传统革命史研究的核心区域韧性认知框架,为重新理解边缘地区革命韧性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样本。这种再理解的核心,在于跳出对革命韧性静态坚守或单一维度的固化认知,从边缘地区的生存逻辑与斗争实际出发,挖掘其韧性构建的特殊性与复杂性^[2]。

边缘地区“革命韧性”的首要基底是“生存优先”的理性选择,与核心根据地的韧性路径形成鲜明差异。对大青山根据地而言,“活下去”是实现战略价值的前提。根据地军民构建了适配边缘环境的极限适应模式:自然环境层面,摒弃固定据点思路,以山洞为营房、炒面为口粮,在严寒中采用骑兵游击的流动生存方式,将地形劣势转化为隐蔽转移、快速突袭的优势,依靠蒙汉群众的隐蔽支援维持生存;资源供给层面,放弃统筹分配经济模式,通过分散垦荒、以物易物、秘密采购等多元路径破解封锁,组织战士融入当地生产生活,以最低资源消耗实现存续目标。这种以生存为核心的韧性,是边缘地区革命力量对先存活再斗争逻辑的精准把握,构成其区别于核心地区韧性的本质特征。

边缘地区革命韧性的支撑体系,离不开“民族协同”与“在地化动员”的合力。大青山作为蒙汉杂居区域,根据地党组织跳出汉族中心动员思维,将蒙汉联合抗日嵌入韧性构建底层逻辑:尊重蒙古族习俗,严禁侵扰牧民利益,在部队纪律中增设专项保护条款;组建“蒙汉抗日游击队”,用蒙古语传播抗日主张,结合在地诉求动员群众;主动与蒙古族上层人士沟通,达成抗日协议并争取关键支持。这种民族协同转化为“在地化动员”的核心纽带,根据地干部深入农牧民家中,以“算日军抢掠牛羊账”“讲家乡被占的苦难史”等真实故事替代抽象理论宣传,发展民兵自卫队、妇女救国会等群众性组织,让革命从军队的斗争转变为蒙汉群众共同的抗争。^[3]这也就形成了内生性支撑体系,即便遭遇挫折也能快速恢复力量。

更重要的是,边缘地区革命韧性是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应对”的动态演进过程。1938-1940年根据地初建阶段,韧性主要体现为避实击虚的被动应对,核心是保存有生力量;1941年后,面对日军重点扫荡,党组织主动调整策略推动韧性升级:军事上发展骑兵步兵联防战术,组建草原侦察队掌握日军动向;经济上转向集体生产与地下贸易网络,开辟秘密运输线;政治上建立蒙汉联合抗日政权,吸纳蒙古

族代表参与决策。这种动态适配印证了边缘地区革命韧性的本质,为理解其他边缘地区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3 对“民族统战与革命动员”的学术启示

大青山革命根据地在蒙汉杂居的边缘情境下开展的民族统战与革命动员实践,突破了传统革命史研究的单一范式,为当代学界深化相关理论、完善研究提供了兼具历史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学术启示。

从民族统战研究维度看,大青山根据地的实践首先突破了统战对象仅聚焦上层精英的认知局限,揭示出上层联络与基层动员相结合的立体统战逻辑对多民族地区的适配性。^[4]过往研究多关注少数民族上层群体,忽视基层民众的基础性作用。大青山根据地的实践证明,仅靠上层协商难以形成持久合力,唯有兼顾精英与民众,将统战主张转化为基层民众的切身利益诉求,才能构建稳固防线,为边疆民族地区统战史研究提供了完整分析框架。

其次,修正了民族统战与阶级动员相互对立的学术误区,展现出民族利益与阶级诉求相融合的动员策略在多民族地区的有效性。传统研究认为二者存在天然张力,但大青山根据地的实践找到两者结合点:针对蒙古族牧民的双重压迫,提出抗日与减租不分民族的主张;动员汉族农民时,以共同遭遇引导其理解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通过互利共赢政策让民族联合转化为实际利益,为学界重新审视民族地区革命动员逻辑提供了新视角。

从革命动员研究维度看,拓展了在地化动员载体的研究视野,揭示出依托民族文化符号、适配生产生活场景是边缘民族地区提升动员效能的关键路径。过往研究聚焦标准化动员载体,却忽视边缘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导致初期动员遭遇水土不服。根据地创新在地化动员载体:文化符号层面,将抗日主张融入蒙古族传统文艺形式,利用传统节日开展动员;生产生活场景层面,将动员嵌入日常劳动中,通过拉家常式宣传、组建互助生产队等方式,深化民众对革命主张的认同,为研究多民族地区革命动员的差异化路径提供了新素材。

此外,为革命动员的动态调适性研究提供了重要样本,凸显出“根据民族关系变化调整动员策略”是维持动员持续性的核心。根据地存续期间,民族关系因多种因素不断变化,动员策略也随之动态调整:1939年日军挑拨蒙汉矛盾时,动员重点转向揭露日军分化阴谋、宣传蒙汉互助案例;1942年物资极度匮乏导致部分蒙汉民众产生矛盾时,动员重心变为组织联合生产、公平分配物资,通过解决实际利益冲突巩固民族团结。^[5]抗战后期蒙古族青年参军热情高涨时,组建“蒙古族独立骑兵连”,保留民族习俗。这种动态调整逻辑打破了动员策略固化的研究预设,为学界研究革命动员的适应性机制提供了具体案例。

4 对“微观历史与宏观叙事互补性”的认知深化

大青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是微观历史与宏观叙事相互映照、彼此支撑的典型样本。长期以来，中国抗日战争史与中共革命史研究多以宏观叙事为核心，聚焦整体性议题，对边缘根据地的微观实践关注有限；而部分微观史研究易陷入碎片化困境，难以与宏观历史脉络有效勾连。大青山根据地的历史实践打破了这种割裂，推动学界从单向印证转向双向赋能的研究视角。

从微观实践支撑宏观叙事的维度看，大青山根据地的微观历史细节，为宏观革命理论与战略的落地可行性提供了具象化佐证，弥补了宏观叙事在实践层面的解释空白。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例，传统研究多聚焦宏观层面，而根据地的微观实践中，蒙古族牧民掩护汉族游击队员、村民冒死为八路军采购物资等个体行动，正是宏观主张在基层的具体落地。再如敌后游击战争战略，微观史料中游击队员用羊皮裹脚、改装马鞍、以狼粪传信等细节，具象化了灵活机动的实践形态，证明宏观战略必须适配局部环境才能生效，让宏观叙事从抽象理论转变为可感知的实践过程。

更进一步看，大青山根据地的历史实践揭示了微观历史与宏观叙事的双向修正机制。微观细节可补充甚至修正宏观叙事的偏差，传统宏观叙事对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描述，多强调大生产运动、统筹分配等模式，而大青山根据地的微观史料显示，边缘地区的经济实践更依赖分散垦荒、蒙汉以物易物、秘密贸易等非标准化方式，这些微观经验修正了敌后经济建设模式单一化的宏观认知^[6]，证明宏观战略在不同区域会呈现出差异化的实践形态；宏观视角也可引导微观研究挖掘更深层的历史内涵，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宏观视角出发，蒙汉群众共同救治伤员、蒙古族青年加入汉族游击队等以往被忽略的微观互动，被解读为民族交融的早期实践，历史价值得到进一步凸显。

大青山根据地的案例充分说明，历史研究既不能脱离宏观叙事陷入微观细节的迷宫，也不能忽视微观历史导致宏观叙事的空洞。只有将微观实践置于宏观历史脉络中解读，同时以微观细节丰富宏观叙事的内涵，才能更全面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7]，让历史研究兼具整体视野与人文温度，为当代革命史、抗战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借鉴。

5 结语

大青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以其独特的边缘属性、鲜活的民族实践与丰富的微观细节，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敌

后抗战史的代表性局部样本和深化革命史研究的重要认知载体^[8]。

从对边缘地区革命韧性的再理解中，该根据地突破核心区域韧性范式，以生存优先的底层逻辑、民族协同的多元支撑与动态适配的演进路径，深化了边缘语境下革命韧性的内涵，证明极端困境中的革命存续是基于环境特质的主动创造；从对民族统战与革命动员的学术启示中，其上层联络与基层动员并重、民族利益与阶级诉求融合、在地化载体创新的实践，打破了传统研究的单一框架，为多民族地区革命共识的构建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经验^[9]；而从微观历史与宏观叙事的互补性认知中，清晰揭示了二者双向赋能的关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回溯这段历史，大青山根据地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战略贡献，更在于为当代学界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多样性提供了关键钥匙，证明革命的成功是在不同条件下不断调整策略、融入在地的创造性过程。这一认知既提炼了其研究价值，也呼应了其“关键样本”的定位，为深化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及边疆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兼具历史深度与方法论意义的启示，其蕴含的团结协作、坚韧创新精神，也将持续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红色基因提供深厚的历史滋养^[10]。

参考文献

- [1] 马丽,李峥,秉浩.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5,(04):19-27.
- [2] 张朋.“韧性革命”: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印刷工作的构筑及其运转[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25,49(04):59-70.
- [3] 董玉梅,药正声.抗战时期大青山骑兵支队的教育研究[J].历史教学问题,2023,(05):163-175.
- [4] 刘扬,刘意.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J].党史博采,2023,(02):14-18+31.
- [5] 哈丽娜,赵图雅.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蒙古马精神”基因初探[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06):96-100.
- [6]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J].实践(党的教育版),2020,(09):64-65.
- [7] 呼和浩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J].中国老区建设,2018,(12):56.
- [8] 马永真.内蒙古回族红色史料的历史意义及革命传统教育价值[J].回族研究,2018,28(03):27-31.
- [9] 黄志高.抗战时期中共“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形成的历史考察[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8,11(02):105-114.
- [10] 宋雅岚.试论绥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方面的特点[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03):47-54.